

一九三六年

時論

創刊號
第38期

創刊號

時論



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示撮
1936年10月8日，于上海九仙桥青年会(局部)

日 五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二

中日情勢的總檢討
爲關於「技術」問題的一點感想線謀討
略主義的新陰謀
救亡聯合戰鬥而戰鬥門
一大戰門

陳思行
金則人
賀剛明
沈姬予

創刊號目錄

社評 對外交談判的意見

(一)

侵略主義的新陰謀

金則人(二)

中日情勢的總檢討

陳思行(六)

從日本的經濟危機來

莫 涼(一〇)

觀察日本內部矛盾的開展

梁唯文(一四)

從『北守南進』政策來觀察日本的孤立

楊炳偉(一七)

希特勒在西班牙和法國的活動

王 壯(一九)

在中日交涉的最後關頭論救亡聯合戰線

賀 剛(一九)

抗敵救國的理論與實踐

敏 之(二五)

蘇聯史家怎樣觀察中國封建制

何幹之(二八)

批判 對『共同意見』的意見

羅 青(三三)

雜談 關於『技術』問題的一點感想

姬 明(三六)

文藝 爲『大戰鬥』而戰鬥

沈起予(三九)

通訊 東北抗日戰士的生活

盧 吟(四三)

書評 評『學生運動論文集』

王 壯(四〇)



對外交談判的意見

自從英國報紙高唱了「吃耳光不陪笑臉」的論調後，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似乎一新面目，打破從來中日交涉的醜態。的確，我們似乎也看到這回的中日談判，無論如何，在中國方面表面上是有了轉機；但是這種轉機的原因，我們決不要看作是外交官或負責人的態度強硬，而是在全國同胞同仇敵愾和救亡圖存的決心的影響下，才形成這樣一個局面的。

毫不足奇，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代表全國民眾共同的意志，而且隨時得尊重這種意志去實行。在目前，中日關係達到一個非常嚴重的關頭，中國全體人民都在爭取最後的生存權，都在擺脫亡國奴的鎖鏈，都在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而鬥爭，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自然責無旁貸的應該迅速完成這些使命。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五年的過程中，不斷地以外交談判掩飾軍事進攻，這已成為昭然若揭的事實；而在中國呢，可以說是一向在忍辱退讓中開談判，沒有過任何「以拳還拳」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幻想在外交途徑下能够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以求解決中日的糾紛。可是這些幻想都被事實擊得粉碎了。

我們並不反對外交談判，因為兩個國家的關係，是應該由外交來解決一切問題的。但是有一點却該注意，就是外交談判的內容，應當仔細研究和公開。遵照今年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國當局已經表示過，保持領土主權完整這一神聖的原則，蔣委員長在和川樾談判時所提出的，站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解決中日問題，都是中華民國應該堅持的最高信條，都是全國民眾所要求而且必得擁護的信條。

不過，我們應該特別留心的是，要根據客觀事實來看外交途徑，是否能夠像理想那樣得以解決中日問題，得以保持上述的原則和遵守上述的信條。一點也不能否認，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部分固然想採取文明的進攻，從外交上獲得「不勞而獲」的勝利；但是在他們的前後左右，還有急進的侵略主義者的強硬主張，而事實上，它們是隨着外交談判的幌子，進行着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目前，綏東日偽軍侵入平津，軍的大演習，長江日本艦隊的大調動，積極組織華北五省實際上脫離中國主權的運動，在上海佈防戒嚴的繼續加強等，這一些，不是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要求解決中日問題，而是說明中日問題更加嚴重起來。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兇，就是它伴着外交途徑，時時刻刻都在走軍事路線；它可以哼氣把局面變得緩和一些，但是它可以馬上咆哮起來，張牙舞爪。相反的，中國之所以「軟」，並不在於外交談判之路未閉，而在於沒有絲毫抵抗侵略的決心與準備。因此，在敵人咆哮起來的時候，便束手無策。過去的幻想，我們認為是錯誤，未來的補救，起碼應該把握這一點。

我們不反對外交談判，但我們希望不能不敵人花言巧語的，當能够以變臉對付敵人的反目；換句話說，能够在敵人動武時馬上和它「比一比」，「拚一拚」。要做到這一點，毫無疑義的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應該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集中這一切力量，開放一切救亡圖存的任何運動。然後才能真實地保持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性，然後才有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的可能。

目前的中日關係，尚在談判過程中，不管談判的前途是樂觀抑是悲觀，中國方面至少應該作「以血還血」的準備，至少應該忠實地明白這是到了「最後犧牲的關頭」，乃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針對着這種形勢，在中國，目前應該把捍衛國土的軍隊，調到國防上重要的地方去；應該保障一切言論的自由，應該就各地訓練民眾，組織民眾，編制成後備軍，應該調查全國的物資與人才，以便作最後犧牲時的使用；應該迅速的遵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聯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果做到這幾點，外交談判即使破裂，也是於我們有利的；不然，在敵人槍刺下的外交談判，只不過等於向敵人要求懲罰，重蹈過去降服的覆轍而已！

壇論 侵略主義的新陰謀

金則人

國際政局的演變，雖然在它的趨向上不難看出一條路線來，但其進展之速，有時竟也出乎意料之外。

單就歐洲的局勢來說：過去德奧之間的矛盾是極端尖銳的，這尖銳的矛盾關係，反映到意德之間，也使意德兩國不能調和。可是經東非一戰之後，局勢就大不同了：由於法西德國對其「同志」在侵阿戰爭中給與了若干的便利——侵略政策的支持，經濟及外交上有一形無形的援助等等，使墨索里尼感到「同志」希特勒的知遇倒是不可多得的；由於兩國在侵略政策上的抱負是一致的，而且他們都覺悟到兩國若是各自孤立地進行侵略，則在龐大的和平勢力之前，都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於是他們便暫時擋置了他們之間的宿怨，非但「言歸於好」，而且緊密地勾結起來。同時，隨意德兩「法西同志」的勾結及由墨索里尼的牽綫，許樞尼格便攜了粧盒——奧國投入了希特勒這位單身漢的懷抱。雖說是怨偶，但却也大有助於好戰主義者的侵略哩！

不是嗎？比利時和法國有緊密而確固的軍事同盟關係，而且在戰前，她是大大地吃過德帝國主義的虧的。爲了她自身的安全，她應該擁護和平的，她和法國軍事同盟的關係是應該繼續維持下去的。誰能料到她會離開法國呢？誰能料到她要「孤立」地保證她自身的安全呢？然而她竟也宣佈「中立」，這不是很奇突嗎？不是出乎意料之外嗎？然而這也不是偶然的，我們是不難找出她所以「中立」的理由的。按比利時是洛迦諾公約簽字國之一，自洛約被德國廢棄

在過去，我們說「侵略陣線」，那還不過是指幾個侵略主義國家在政策和行爲上的趨向大致不差，在對和平的進攻上，在對弱小民族的迫害上，他們也差不多都是一致的，因而我們說他們之間好

以後，她的國土便完全暴露在德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之下，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時日，由於英國態度的曖昧，意大利的拒絕再參加，以及法國的堅持集體安全的不可分割等意見分歧，主張不一眼見得足以保障西歐安全的新約是難以訂結了。這不能不使比利時失望而走到別的道路。但在這裏與其說英國的態度曖昧倒不如說這是英國的陰謀。英國現下的外交政策，主要的是在使法國陷於孤立，藉以拆散法蘇的提攜，但同時這裏面也隱藏着德國的破壞。記得在去年的一個什麼時候，希特勒曾派其外交代表李本特羅浦到比京去活動過一次，那一次活動的結果如何，雖然未見公報，可是這裏面說不定有英德對比口頭上的保證或竟訂有什麼密約亦未可知，但這是爲了拆散法比同盟使陷於孤立，則是毫無疑義的。由於這些慾望和誘引，比利時之宣佈「中立」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

但比利時宣佈了中立以後，是不是就能保證她自身的安全呢？恐怕剛剛相反，她越是離開了和平陣營，便越不能保證安全。不論希特勒的劍鋒將來是東向或是西指，首先遭受犧牲的恐怕就是比利時。因爲法蘇訂有軍事互助的關係，祇要法國不放棄這關係，則德國東犯時，她必須要防備法國的後襲，因而她的後方的第一道防線必然是比利時。假定德國西進，則前方的第一道進攻線也是比利時，她是無論如何保持不了中立的。她之宣佈「中立」無非是當了英德意三帝國主義的傀儡而已。

凡此一切，不過是說明侵略主義的陰謀日益顯露，歐洲的局勢日趨不安而已，但主要的危險似乎還不在這裏

面的確還在各國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上。我們早就說過：對法西斯的援助叛軍，若不以同樣對西班牙政府的援助或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加以制止，一百二十個不干涉協定也是沒有用的；德意葡雖都也參加了協定的簽字，但這一紙協定究竟不是阻止飛機大砲的障壁，它之無力和零是一樣的，而且在這不干涉協定的限制下，使西班牙合法的政府無從獲得合理的援助，而德意葡則依然援助叛軍如故，尤以倫敦不干涉委員會在英國不公正的主持之下，成了干涉主義者的庇護機關。雖說英國首先贊成建立法國所提議的不干涉制度，然其實英國的軍火商都也派有代表在葡京里斯本和叛軍做着買



賣。而葡萄牙之成爲叛軍軍火的取給地以及最近之宣佈與西國絕交，且承認反革命的政權，與其說是「受到德意的影響」（十月二十七日申報時評上這麼說）倒不如說是受英國的幕後指使。英國不是早就聲明過葡萄牙和她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她不願葡國受到西國革命的影響嗎？她之害怕西國人民陣線的政權繼續存在下去而竭力援助叛軍，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不過英國的政策，其狡猾也就在此，她要削弱法國的勢力，但她不自己露面，她可以指使德國出頭。她之干涉西國內戰，她也儘可以利用葡萄牙啊！

爲了正義，爲了世界各國合法政府之獲得合理的保障，爲了民主制度之不受摧殘，爲了世界和平之不遭破壞，蘇聯不止一次地向不干涉委員會提供事實的證據，向委員會主席樸資茅斯爵士提出聲明書，要求迅速考慮有效的制止辦法，而樸氏不是虛與委蛇，就是拒絕請求，延不集會，縱集會也是迭次俱無結果。他們對於德意等法西斯的飛機大炮

運到西班牙去向西國人民作非人道的屠殺，日益擴大地演着流血的慘劇，簡直閉目不見，塞耳不聞，堵口無言。不干涉協定反而成了干

進發。」英政府還致文於不干涉委員會，指摘蘇聯違反協定。於此可見委員會的居心叵測了。

蘇聯已經不止一次地以糧食及醫藥品救濟西國婦孺，乃是事涉主義者的煙幕，反而使西班牙政府受了不干涉的限制。像這樣的不干涉協定和倫敦委員會，讓它們存在着作惡，不如讓它們毀滅掉。因此，蘇聯纔憤然聲明將退出協定和委員會。可是當蘇聯聲明要退出協定以後，倫敦方面馬上就盛傳有「蘇聯貨船一艘駛入地中海，滿載大批軍械，尤其是大砲多尊置於甲板之上，歷歷可睹。」而倫敦各報且載「蘇聯貨船三十艘，現在地中海，向西班牙巴塞隆那港

藉口而加以攔截的。蘇聯會不會因了不願引起糾紛而根本放棄其



地中海的通航權呢？不會的。那麼，不會既然，德意就免要在地中海
上製造事端了。

在這一事件中，法國的態度，頗值得指摘。法國最初的中立就是
懦怯的表示，繼而作不干涉的提議，也是非積極的態度，最近蘇聯主
張封鎖葡萄牙諸港，以制止干涉，而法國則與英國同樣加以拒絕，此
種畏首畏尾的政策，雖說為避免引起「國際重大的糾紛」，但倘使
叛軍獲勝，則非但國際糾紛不可避免，且其自身的安全恐也難保。所
以我們說法國的這種態度，為自身計，為世界和平計，俱非得策。自然
法國的現政府雖說是人民陣線的政府，但它在侵略主義者的重重
包圍之中，以及國內反動勢力的壓迫之下，它的政策的執行究竟是
有限度的，它的態度不堅決也不是偶然的。

正因為如此，纔給了墨索里尼以提出「新四強公約」的機會。
他們正準備着「金鉤釣海鯊」的計謀，企圖把法國拉過去。這「新
四強公約」有無結成的可能，固難逆料，但最近成立的德意「議定
書」可說就是侵略陣線公開的「綱領」，而這「綱領」雖說以「反
共」為號召，其實質却是通盤破壞世界和平的陰謀。由於德意等法
西斯拼命的活動，與法國態度的不堅決，使小協約國大有將背法國
而去之勢。南斯拉夫有繼德國承認阿比西尼亞為意大利領土之說，
而羅馬尼亞政府黨自由黨的領袖國務協理，最近在黨大會中稱「
有條件地保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國家農民黨則稱「羅馬尼亞陣
線『素以同情意法西主義德國國社主義稱於時』」。在這裏可以
看出羅馬尼亞雖不擬與蘇聯反目，然以有條件之故，恐難保持似與
英德意三國之友好關係吧。說不定也會受「反共」的煽惑，而成為

同時，我們還不能忽視東方的憲兵也在以「共同防共」向中國政府進逼的這件事。所謂「防共」自然不只限於中國國內的「共」，同時也具有防中國以外之「共」的意義，正和西方的「反共」遙相呼應着。中國政府對此將表示怎樣的態度，我們還不清楚，但倘使不加以嚴峻的拒絕，或中國的對外政策沒有根本的轉變的話，則東方反共陣線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侵略主義者的影響現在顯然是擴大了，他們的陣線是形成了，而這陣線的形成，固然是侵略主義者肆意煽惑的結果，同時也不能說與和平勢力的擴張毫無關係。反之，侵略主義者的擴張也幫助了和平勢力的強化。比方各國人民陣線運動的邁進與國際反侵略、反法西斯運動的展開差不多是用不着舉例證明的。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可以說侵略與和平已經走上極端尖銳對壘的階段，現時課給我們的問題，是和平怎樣與侵略作決定的鬥爭的問題了。

我以為「和平」決不是維持現狀的和平，即蘇聯所推行的和平政策，其中心旨趣恐也不在現狀的維持。倘使是國際形勢仍須照舊維持下去的話，我以為這種和平是難保的。和平勢力是如此的雄厚了，然德意等侵略主義者却並不因而退縮；反之，他們倒要與和平作一必死的決鬥。那原因就是為了他們不滿於現狀。假定要照現狀維持下去，則德意等國的法西政權便不能存續。所以他們不得不冒著極大的危險來作這孤注的一擲。

不過，侵略主義者所要求的改變現狀與和平方面所要求的改變現狀是不同的。前者要重新分割世界，而後者則主張世界的不可分割。前者是為了私慾的滿足，後者則是為了被壓迫人類的挽救。

既然說，和平是在受着威脅，那麼戰爭也就不易避免的了，因而我們大可不必從事什麼和平運動了。是不是？剛剛相反，越是和平運動不在維持現狀，而在把極大多數的人類爭取到和平的旗幟之下來，把現制度作決定的變革，真正的永久的和平纔得實現。

中日情勢的總檢討

陳思行

因為目前中日關係已達到一個空前緊張的新階段，所以在許多關心時事的人們的心目中，都會有這樣的問題：究竟中日會不會開戰呢？英國對中日問題能起什麼作用？我們對目前的危機應該怎樣應付？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

先從日本侵華政策說起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整個政策雖然是不變的；但牠在進行滅亡中國的過程中，為要適應各時期種種複雜的條件和情勢，牠的策略和辦法却是常常改變的。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看清楚了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實情，認為是最適宜於用武力進攻的。牠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藉着不抵抗主義者的幫忙，繼續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四省，察哈爾和華北的一部分……從九一八事變到塘沽協定的成立（一九三三年），日本在這時期中對中國的侵略，是採取先軍事而後外交的策略。這就是說，日本要首先用飛機大砲轟炸了中國的要塞，佔領了中國的領土，然後再用外交手段，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種種喪權辱國的協定。但在這時期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却受了不少的教訓和獲得了不少新的知識。第一，牠看清楚了：用武力

進攻中國，實在是不上算的，一方面會遭受莫大的損失，另一方面又會激起中國大眾反日的情緒和引起國際上的注意；第二，牠深切地明白了中國當局是容易對付的，只要用些威迫利誘的手段，就可以得到不勞而獲的利益；第三，牠還要顧慮到軍事的冒險，很容易引起財政的破產，國內大眾的反抗以至整個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事實上已是這樣發展着）……因為這種種原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成立後，即變更方針，從新採取先外交而後軍事的策略，即先用威迫利誘，再用軍事來保證牠的勝利。在這一策略下，牠還唱出許多新奇怪異的外交口號，如「水鳥外交」、「協和外交」和「啄木鳥外交」等等，但這些口號都是根據一個原則的，即所謂犧牲最少，收獲最大的原則。日本帝國主義者運用這個原則，果然得到了很大的收穫：冀東內蒙偽組織的成立，華北經濟權的攫取，領空上無限制的飛行，各地軍事特務機關的遍設，華北各軍事要點的增兵，「特種貿易」的推行，以及愛國言論和愛國運動的干涉等等。

然而，日本軍閥還嫌這樣的辦法走得太慢，他們時時刻刻想由自己動手，要把中國一口氣吞下去。最近隨着日本經濟危機的向前發展（對外貿易的衰落，財政的無辦法，農村的破產，大眾反法西斯

運動的日益抬頭)以維持「帝國治安」和發揚「王道精神」為已任的日本軍事法西斯蒂益加躍躍欲試了。廣田內閣就是在他們指揮之下，重新向中國採取大規模的攻勢。

在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布置之下，接二連三的「偶然事件」

發生了。明眼人都知道，這些許多「偶然事件」決不是出於「偶然」的。日本帝國主義要以這些事件為藉口，企圖運用一貫的威迫利誘

的手段，強迫我們政府在無數次屈辱之後，再馴伏地接受牠滅亡中國的七項要求：(一)華北五省自主；(二)中日經濟合作，包括減低關

稅及採礦、交通、農業、工業等部；(三)中日共同防共；(四)在長江一帶及海南島駐兵；(五)禁止抗日運動，包括取締國民黨，解散救國會及參加修改教科書；(六)聘用日本軍事顧問；(七)福岡至上海的航

空權等。(以上外報所傳不一大意如此)同時，最近日本的報紙和通信社更大宣傳特宣傳要是中國政府不答應牠的全部要求，牠就要「不辭決裂」了。但日本是不是真的希望和中國「決裂」呢？我以為這只是一種恐嚇，牠的真意是決不如此的。因為日本的軍閥雖然「躍躍欲試」，但牠們的主人會教訓他們：日本主要的強敵，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和英美；如果有更好的辦法，為什麼一定要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以致損耗「帝國」的國力，而減弱對蘇聯和英美的力量呢？自然，日本軍閥是不肯軟弱的，他們最少也要督促他們的政府採取強硬到不能再強硬的政策。

這回日本政府在軍閥嚴厲督促之下，確是有急速滅亡中國的決心的；但他們所渾用的手段仍然不出一九三三年以來的一套，即

企圖用最低的代價，把整個中國吞併，最少也要強迫中國首先承認「華北五省自主」和「共同防共」兩項要求（因為實現了這兩項

要求，日本就可以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去進攻蘇聯）。

但我們不要稍存幻想，以為日本不希望用較大的犧牲，中國就可以利用「外交途徑」達到兩國的「調整」事實上，中日國交已再沒有調整的餘地，除非中國全部或大部分接受日本的要求。在這樣的情勢下，

中國的對策怎樣呢？

五年來，政府對日的政策如何，是大家所熟知的，這已無庸多說。但這次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政府居然採取了較強硬的政策。據外報所傳，張外長以調整兩國那交的立場，曾向日方提出了五項對案：(一)取銷淞滬協定；(二)取銷非法協定；(三)取銷冀東偽組織；(四)撤退察北偽軍；(五)取緝走私。

因為目前是「祕密外交時代」，張外長和川越經過了一次二次以至六次的談判，究竟談判內容如何，中國對日本的要求受到什麼程度，我們無從知道；但到現在為止，政府沒有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我想是事實。

政府採取「強硬」態度我們自然是非常歡迎的，政府只要能夠根據今年七月十三日二中全會所發表的宣言，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在「用盡外交方法不能排除日本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種種事實，政府就認為最後的時候已到，毫無顧慮地對日抗戰」，我們當然要竭誠擁護。

但是，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這種決心，準備要發動抗戰呢？最少，在目前事實的表現，還不能使我們這樣相信。第一，在軍事上，並沒有看到忙於對外的準備，只看到中國的大軍還集中在貴州和西北；第二，

在政治上，各黨各派的聯合，民衆運動的開放和言論自由的保障，還全無消息；第三，在外交上，除對狡猾的英國外，對其他以平等待我的友邦，還沒有進行聯合的決心……從這許多的事實來看，都使我們對政府抗日的決心不能不抱着疑慮（我們自然並不願意如此）。

那麼，政府為什麼採取「強硬」態度呢？我們認為最少是由兩個因素促成的：第一是民衆的壓力，雖然目前政府還沒有澈底相信民衆的力量；但民衆反日情緒的高漲，使得政府在舉行外交談判時，不能不有所顧慮，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第二是英國的撐腰，因為英國紳士屢次向日本吊膀子，企圖恢復舊恩愛，都沒有得到成功，最近日本又向中國採取新的攻勢，牠看到若果再不想辦法，中國快要為日本獨占了，牠自己在中國的利益也快要完全喪失了，因此牠不能不對中國作某種程度的支持。但若果我們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以上的兩種因素會促進中國政府馬上發動抗日，那就未免過於樂觀了。

中國民衆的力量雖然是偉大的，但在目前還沒有發展到了使政府的政策不能不以這力量為轉移的程度，因此，我們若要希望這一力量能促進政府抗日，事實上還有待於牠的鞏固加強和發展。至於英國，牠是決不願意幫助中國對日作戰的。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英國對中國的撐腰，并不是為着中國，而却是為着大英帝國自己。為着牠自己打算，英國在援助中國的過程中，不但不願意中國發動抗戰，而且還很有可能半途出賣中國。目前日英在東京的祕密談判，幹的就是這些勾當啊！

我們要澈底了解英國為什麼不願意幫助中國抗日，以及我們對英國究能利用到什麼程度，我們須研究英國的整個外交政策，尤其是不可能的。其次，胡先生似乎只看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而沒有看到英國人民的力量。我們知道，英國的人民陣線，正在向前發展，其是

英國的遠東政策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卓越的國際問題專家胡愈之先生已經在《世界知識》（五卷三號）和《現世》（一卷五期）上發表了兩篇有力的文章（英國的遠東政策和中日問題與英日關係），與胡先生的論文同時出現的還有伏生先生在《生活星期刊》（一卷十二號）的一篇短小精幹的傑作（英國在幹什麼）。這三篇文章都是同一觀點的，其主要意思是指明：我們依賴英國是很危險的，若果我們始終依賴牠，將會得到和那個倒霉的農民同樣的結果（請參看英國在幹什麼）。在打破一般人希望英國幫助中國抗日的幻想這一點上，這幾篇文章的確是值得推贊的。

但是我們在這裡應該附帶指出：也許正因為胡先生要強調英國的不可靠，他把英國的力量似乎估計得過低。首先，胡先生拿阿比西尼亞和中國相比，我們認為是不很適當的。儘管阿比西尼亞的地位也相當重要，但比起中國來，實相差甚遠。事情非常明白，意大利不會因為吞併了阿國而驟然强大起來，但假如日本把中國完全吞併，情形就不同了。大家試想一想，日本把中國吞併以後，遠東將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那時候，日本比英國的勢力必然驟增幾倍，那麼，英國不但要完全退出中國而且還要退出印度，試問英國能夠這樣做嗎？所以我們以為英帝國主義在不妨礙到牠對遠東的交通的條件下，對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牠可以對意大利讓步，但若果因此就斷定英

國對於中國問題也同樣可以對日本作同等程度的讓步，恐怕事實是不可能的。其次，胡先生似乎只看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而沒有看到英國人民的力量。我們知道，英國的人民陣線，正在向前發展

着，這個力量的發展，不是絕對沒有轉變英國保守黨政府政策的可能的，到了那時，英國就決不會再對侵略主義者繼續讓步，因此我們目前斷定英日關係只有兩個前途，似乎未免過早一些。

我們提出這種意見，並不是要鼓勵那些迷信英國路線的人繼續迷信下去。剛剛相反，我們認為走英國路線是一條死路，因為儘管英帝國主義不願意放棄在中國的全部利益，但牠犧牲中國而與日本妥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我們單認識了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我們對事情要有正確的估計，然後我們才能有正確的實踐。我們明知英國是不可靠的，但我們假如能聯合其他可靠的國家，而把英日的對立也估計在里面，這樣，我們對救亡工作的開展，不是會有更大的自信和幫助嗎？到這裡，我們要說到：

中日關係的前途和應付辦法

假如我們上面的分析不錯，我們已可以明白日本正企圖以最少的代價向中國奪取最多的利益，因此日本在主觀上是不希望和中國開戰；其次，英國不願意中國發動抗戰，中國當局從事上的表現也還沒有抗戰的決心，那麼，中日戰爭不會由這幾方面的當局有意識地引起是很顯然的；但我們不能由此斷定中日戰爭的爆發，絕對沒有可能，因為全中國稍知「廉恥」的人們都只願抗戰而死，決不願做奴隸而生！由這些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加緊督促政府或自

動起來發動抗戰，戰爭是有可能爆發的。
在今日，「抗戰則生，不戰則亡」，這已成為全中華民族共信的格言了。

為了避免無為的犧牲，為了集中中國力對外，我們希望聰明的政府接受全國人民抗戰的合理要求，拒絕日本帝國主義一切無理的要求。為了保證抗戰的勝利，政府應該：

(一) 在外交上，一方面絕對公開，以博得全國人民支持；另一方面拋棄依賴英國的危險路線，而立刻聯合美蘇英和太平洋沿岸的國家，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二) 在內政上，集中全國人才，不分黨派男女與老幼，實現真正

的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抗日言論與抗日運動的自由；

(三) 在軍事上，把常備軍調到國防的第一線，同時武裝全國民衆加入作戰。

到這裏，一定有人會問：我們「希望」和「督促」是一件事，政府能不能這樣做又是一件事，要是政府的行動與我們人民的希望始終相反，我們又怎樣辦呢？

是的，我們雖然不希望如此，但我們仍須預防有這一地步；因此我們對目前救亡陣線不應以上層的呼籲為滿足，而應該時時刻刻努力加強下層的力量，只有下層人民的集體的力量加強了，我們的整個陣線才有力量，我們民族解放的勝利才有保證！

從日本的經濟危機來觀察日本內部矛盾的展開

莫 涼

一九二九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怒潮，襲擊了島國日本。日本生產的總額，在恐慌的直前時（即昭和四年）為七十七億五千九百萬八千元，此後遂逐年下跌，至一九一八前夕的昭和六年度，生產總額遂減至五十一億七千八百十三萬五千圓。同時在物價的狂跌上，亦可看出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刻。蓋昭和六年，日本農產品物

價，比較昭和二年約跌了百分之四三·四。工業生產品價格雖沒有農產品跌價之猛烈（主要原因是獨占資本主義對於物價的壟斷），但比諸一九二九年則幾跌百分之三〇·一。日本資產階級對於這一嚴重的經濟危機，是採取怎樣對付辦法的呢？第一就是積極的以武力侵略中國，企圖獨占中國的市場與原料。第二就是在昭和七年實行禁金輸出，人為的來壓低日元對外匯兌價，準備與世界列強的商品作大規模的競爭。後一政策的目的顯然是因日元跌價後，日貨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即可減低，以便大量的傾銷。而前一個政策，則更被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解決日本經濟矛盾的唯一「國策」，於是便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以及永不停止的進行準備，侵略中國。

五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實行這兩個政策的結果，無疑的是得了很大的成功。——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特別在亞洲大陸上，遂得無敵的暢銷。日本國內生產量的增加，亦超過了恐慌前的水準。但是這樣的「成績」，是不是已經表示了日本資本主義危機可以從此解決呢？那末我們的回答，却是一個否定。這五年來日本帝國主

義經過殘酷的掠奪殖民地與其國內的勞動者，固然暫時間已經得着相當的成功，但是這却把日本社會內部舊有的矛盾基礎，更加擴大了。矛盾的對立現象，在新的姿態上亦更表現出了他的空前尖銳性。以下我們且把這個問題，作一個概括的分析。

我們要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自身危機，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那末我們首先應當從日本經濟發展的矛盾出發。五年來日本工業生產的恢復，比較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來得快，這無疑的是與軍需工業的發展，有直接關係。所以這種經濟發展顯然並不以改善國民生活為前提，却正是建築在國民大眾生活的日益貧困化基礎上的。我們只要一看從昭和四年來，日本工業生產的比重之變化，就知道日本工業生產品增加最速的是金屬機械化學工業（主要是作製軍火用的），而國民的消費品工業，如紡織品、食料品工業等，則反相對的減低了他的比重。（註一）日本輕工業中主要的二種工業紡織品與食料品生產，在一九三一年的恐慌最高點以後，雖然也有很大轉機，但在昭和九年度却尚未超過昭和四年度的生產量。然而至于與軍需品有關的工業如金屬機械化學等工業生產，則早已超過了昭和四年度的生產指數。（註二）日本輕工業生產品因為國民消費的不旺，再則受世界各國輸入限制與競爭的影響，在昭和十年開始，生產限制是更加厲害了，特別是人造絲、絹紡、紡織、食料品等工業，所以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工業生產之發展是很畸形的，他的

發展與國民的生活改善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依賴軍需工業發展所造成的跛行景氣，實際上潛伏着日本資本主義一個重大的危機。因為這一種景氣的繼續，只有不斷的擴大軍備與侵略，方有可能。不然，則日本未來的經濟恐慌必然將在非常狀態下展開。這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是決定了日本資產階級不能放棄繼續對中國侵略的政策。但是這一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使得國內經濟矛盾更加尖銳化了。因為這使得國民經濟生活更加非常地痛苦，因此加倍的縮小了日本國內市場的緣故。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軍需工業的發展是以剝奪大部份國民的生活資料為基礎的，或者經過發行公債，或減低一切國內的必需設備等的方法，來加重國民的負擔，把國民所有的餘資都移作了軍事工業的生產。

自昭和七年以來（滿洲事變後），日本農村的負擔，因為國家財政膨脹，無論那一項都激增了，這是誰都知道的。按昭和七年農家對國稅負擔，每年每戶平均約為五四圓。到昭和十年已增至六五圓。地方稅負擔亦由四一圓增至四九圓。同時地主對於國家的負擔，自然也就不能不增加了。但是地主支出增加以後，則其必然的結果，是反

（註一）各種工業生產額對生產的總比例表（見日本經濟年報二十四輯）

	昭和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紡織工業	四一·四	三六·五	三七·二	三七·〇	三七·〇	三三·七
食料品工業	一五·一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四·七	一二·九	一一·一
金屬工業	八·四	八·四	八·三	九·九	一一·二	一五·九
化學工業	一三·四	一五·二	一五·二	一五·八	一六·四	一五·八

（註二）日本主要輕工業及重工業生產增加的狀態

	昭和四年	昭和六年	昭和九年
紡織工業	一一〇	一〇〇	九九·七
食品工業	一一〇	七二·〇	八九·〇
軍需工業	一一〇	一一〇	一六·六

（按此表係根據日本經濟年報二十四輯，昭和四年——九年主要事業生產額推移表計算而得的）

此外佔日本人人口十分之一的勞動者實際所得工資，在昭和七年之後顯然也是逐漸地降低的。到最近為止，日本勞動者平均工資甚至於比較大正十五年時代（即十年以前）還要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光景。但是勞動的強度却比前是增加了。因為從工人工資所得總額之增加與生產總額之增加相對比，則事情是非當明顯的。勞動者生活之日漸惡化，無疑的是更縮小了日本國內市場的日益狹隘化，而加重工業之危機。

所以實行發展軍需工業與減低日金價格二種政策，要想永遠地維持產業景氣，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實也已經證明，到昭和九年為止，景氣上升已將到了絕頂，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特別是輕工業）發展的速度，是急速地減低了。

日本國內有這一切經濟上矛盾的展開，使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事變之後，更不能不準備大規模的掠奪中國的領土，但是這樣一來，另一個矛盾——財政問題與人民生活問題，更加愈弄愈大了。因為軍備既然必須擴大，則政府就不能不向日益貧困的人民身上盡量的剝削；同時因為加緊對人民剝削的關係，亦更使財政問題愈加困難解決，而貨幣本位的動搖問題，亦漸漸地更加趨於成熟了。

從上面簡單的事實看來，可見實行向大陸發展的對策，反而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刻化了。同時日本對於「開發滿洲經濟」的結果，對於解決日本內部經濟的舊有矛盾，却也很少見有效力。因為第一對滿投資需要經過相當的時期，資本方能回轉，這對於貧困的日本帝國主義，實在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對滿投資額最近已呈日趨減少的現象，今年滿鐵募集社債發生了空前的困難。第二，佔領滿洲之後，引起了日本國內產業資本家與在滿投資的

轉來加重對農民的超利潤的封建剝削。所以近數年來日本「救濟農村」的呼聲，是成了國內重大政治問題之一。同時這是日本工業的發展上一個重大的矛盾，亦即是因為侵略超過了限度後，不能不引起的工業與農業矛盾的深刻化。

資本家之間，發生了重大的競爭，因此在滿投資，亦就不是最有利的出路了。（在滿新設八大會社獲利最多者只有四厘或八厘，毫無所獲者，亦有數家。）第三，滿洲的慢性農業恐慌與不斷的抗日軍事行動之存在，多少是給與了日本資本發展的阻礙。所以總上所述，足見「開發滿洲富源」已不能解決日本帝國主義目前的根本的經濟矛盾了。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上矛盾的尖銳化結果，反映在日本政治上的鬥爭，也就空前的嚴重了。

在日本目前政治問題上的鬥爭中，發生二種基本的傾向：第一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對立，是更甚了。——法西斯蒂化與反法西斯蒂的鬥爭是逐漸地成熟了。從五·一五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法西斯蒂運動勢力顯然有顯著的發展。而民衆反法西斯蒂的鬥爭也已開始。第二，就是統治階層間財閥與急進的法西斯蒂派間的鬥爭。因為對於侵略中國的政策上有利害的不同，兩者間的裂痕，是更加日益明顯了。特別在滿州事變之後，他們之間的鬥爭，遂由內閣上的爭論，一變而為暗殺、短兵相見了。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隊事件、十一月事件、美濃部事件、永田事件，以及二·二六的東京暴動等，就是統治階級血的衝突歷史。

日本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鬥爭的激烈化，首先就是勞動者與一般貧民對於現實的統治漸漸不滿的結果。上面已經講過，「九一八」以來，日本工人實質工資顯然是逐漸降低了。但是資本家的利潤的增加則無疑是急速地增加了。只拿王子製紙會社一個例子來說，在昭和六年下半期，該會社之利率為一分三厘半，至昭和八年下半期即昇為二分五厘，昭和十年為二分四厘，但是該會社之工人工資，昭和六年平均工資每人為一圓七十二錢，昭和九年則只有一圓六十五錢。工人羣衆對於現實統治的不滿，反映在上次衆議員的選舉運動中。同時以勞動階級為中心的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線門

爭，從去年八月起，在大阪也已經漸漸開始，今年法國與西班牙人民陣線勝利的消息，更刺激了日本勞動運動加強反法西斯蒂的傾向，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據最近的消息，「日本勞資衝突，因經濟恐慌日益深刻化而愈趨激化。據內務省統計，今年度爭議事件，計達一千二百六十五件，參加工人共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因此左翼運動在工人羣衆中乃有漸趨滋長之傾向。內務省對此，極為注意，現在計劃採取嚴厲辦法，以資鎮壓俾維持治安云。」（華聯十二日東京電）

日本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間矛盾與鬥爭的加強，另一表現就是在於農民對地主經濟鬥爭次數的激增。昭和十年爭議總件數為五千五百十二件，比昭和九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五十四件，即增加了百分之二三。（見日本經濟年報廿四輯）發生爭議的原因，多半是因為凶災與要求減少地租及要求繼續租地契約。凶災雖然是天災，其實是與農民的貧困無力防飢防災，極有關係，而後面二項原因，更不用說是因為地主剝削增加的結果。

顯然日本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間的這一種鬥爭的尖銳化，是與日本統治階級不絕侵略中國有關，所以這一種對立現象隨着侵略的急進，恐怕是難免更尖銳化的。

但是侵略的結果，不僅把日本國內基本階級的矛盾促進了，並且統治階級間的對立，顯然也是無法調和了。統治階級中財閥的一派——以元老重臣為代表，他們雖然贊成侵略中國，但是他們亦反對代表一部份工業資本家（特別是軍需工業）與地主利益的軍部。因為軍部所代表的階層，顯然是以戰爭為最有利的營業。不僅軍需工業家需要依賴戰爭來發大財，並且地主階級所最希望的是減輕他們的負債。原來近數年來，日本地主的土地，大部分已經抵押於大銀行，所以他們主張戰爭，主張擴大軍備，主張因此大發公債，以資行通貨膨脹。至於其他許多工業資本家，亦因負債過甚，都希望日金的再跌價，與擴張國外的市場，和吸收低廉的原料。但是日本大金融資本家，大康采爾的巨頭們，都很怕過度的財政膨脹，他們反對軍部

犧牲一切，增加「國防」的意見，所以他們的代表者高橋藏相，終於被法西斯蒂所擊斃了。

最近在日本的「行政機構改革」「經濟國策」「財政預算」等問題的爭論中，顯然又可看出這兩派的鬥爭，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負調和重任的廣田內閣，終於又起了「不安」與「動搖」了。現在日本所有的大康采爾巨頭，各政黨（政友會有一部分已法西化者除外），以及代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對於軍部的過份要求，是不贊成的。蓋軍部現在所要求的是傾全國之力，實行「國防」（即所謂千載難逢的機會，實行大陸政策）。他們認為政府決定增稅二萬萬圓之舉太無補實際，所以他們為完成六年的「國防」計劃，要求發行三十億至五十億的公債。同時為了立即實現法西斯蒂的軍事獨裁，他們現在與內閣所爭執的問題，是實行「庶政一新」徹底改革各行政機關，設立不管部大臣，使行政機關集中化與戰時化。在「經濟國策」上，他們主張實行統制經濟，實行電氣、燃料、海運、航空、資源等國策，以充實作戰能力。但軍部的反對者，他們是不願意現在立即改革行政機關，而主張穩定現內閣；主張先行解決明年度的預算問題，再談「改革」，把軍部的主張延宕一下。但是寺內陸相却是以去就力爭通過這個提案的，所以事情的演變，正是未可逆料呢。再發生一次流血事件，也是有可能的。

總之，反對軍部這一派人，因為要避免日本經濟的惡化加劇，他們因此對於這個冒險的積進政策，是相當懷疑的。這一種懷疑的心理，在大資產階級的報紙上，時常有明白的反映。這裏且把《日日新聞》的一段話引在這裏：「國防計劃，不作為外交的前提，則惟無謂的刺殺，敵人的營壘中，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裂痕，這對於中華民族的解救，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不要失去了這個時機，鬥爭的勝利，是更有

訂日俄不侵犯條約為無理由的，并主張對華對俄應即確定政策云。

這二派的爭論，看來雖說是常見習聞的事，但是目前日本國內

經濟的政治的危機之深刻化，已非昔日可比。日本各銀行之存款準備金，幾乎已全部變成了公債，國內的流離資本，也已很少可以移作軍費之用了，而增稅更是絕對走不通的路，所以今後日本統治階級將怎樣解決當前的「國策」呢？這實在是不容易解決的。但是萬事終有一個結果，所以日本政局將來的動向，恐怕是難免完全法西斯蒂化與加緊侵略中國的。這種傾向的成熟，現在已可明顯地看到，問題只是在於急進的法西斯蒂化呢，還是緩進的法西斯蒂化？這二個前途現在雖然尚難逆料，但日本經濟情形如再行惡化下去，金融獨裁統治勢力亦日形衰弱化的話，則急進的法西斯蒂勢力，一定會非常快發展的。如果如此，到了最後，則急進的法西斯蒂武器，終將被日本的統治階級所採取的吧。

★

根據上面的分析，則我們可以完全了解日本的勞動者與農民，如果沒有力量控制統治階級的掠奪政策，那末對中國的侵略行為，是決不會中止的。並且日本國內矛盾愈深刻化，則其侵略中國之心亦必愈大。九一八以前是如此，目前的情形也是如此。中國如果不抵抗，則日本國內之現有矛盾，也許可以在中國求得一些補償。例如「開發中國的經濟」以後，則日本國內產業是可以相當地發展的。但是這却需中國無數萬人民作其犧牲，方有可能。我們爲了不甘心做犧牲品，所以我們決然不能坐而任人宰割，我們需要急起的反抗掠奪我們的敵人，加速的促進其國內矛盾，使日本的侵略政策，在中國人民偉大的反抗戰爭中消滅。因此我們要堅決地反對一切與日本妥洽的投降政策——「中日親善」與「中日經濟提攜」。

敵人的營壘中，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裂痕，這對於中華民族的解放，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不要失去了這個時機，鬥爭的勝利，是更有把握了！